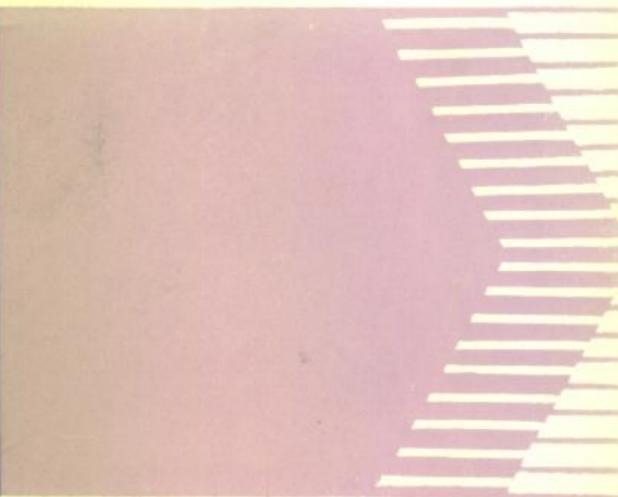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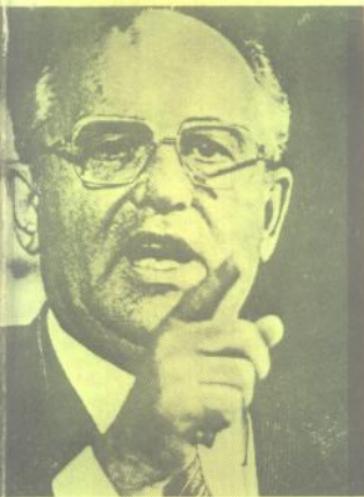


《戈尔巴乔夫年代的改革》系列书



从企业改革入手

—戈尔巴乔夫的
经济体制改革

陆南泉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戈尔巴乔夫年代的改革》系列书

从企业改革入手

——戈尔巴乔夫的经济体制改革

陆南泉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责任编辑 周兴泉
责任校对 李建
封面设计 式一
版式设计 张汉林

从企业改革入手
——戈尔巴乔夫的经济体制改革
CONG QIYE GAIGE RUSHOU

陆南泉 著

*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经销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激光照排
国防科工委印刷厂印刷

787×960 毫米 32 开本 6 印张 95 千字
1989 年 3 月第 1 版 1989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6000 册

ISBN 7-5004-0525-1 / D · 40 定价：2.30 元

《戈尔巴乔夫年代的改革》系列书

编 委 会

主编 陆南泉

编委 (按姓氏笔画为序)

王 器 李静杰

陆南泉 赵乃斌

高中毅

书 目 及 作 者

| | |
|--------------|------|
| 从企业改革入手 | 陆南泉 |
| 民主化·公开性 | 王 器等 |
| 一条马鞍形的认识曲线 | 高中毅 |
| 一个相互依赖的统一世界 | 李静杰 |
| 迎接世界科技革命的新挑战 | 陈义初 |
| | 刘清鉴 |
| 来自莫斯科的改革之风 | 赵乃斌等 |

编者的话

改革的浪潮几乎席卷了所有的社会主义国家。越来越多的人，从最高领导到普通的广大群众，逐步悟出了“不改革没有出路”的真理。

苏联作为一个全球性的世界大国，经过70多年的发展，它的经济、军事实力和科技水平已进入世界前列。但是，政治、经济等体制方面存在的严重弊端，日益明显地成为阻碍苏联社会经济发展的主要因素。苏联在历史上虽在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时期进行过两次改革，但均以失败告终，从而使苏联各个方面处于十分困难的境地。

1985年，苏联第八位最高领导人戈尔巴乔夫执政后，面对严峻的国内外形势，全力以赴地推行改革方针，力图重建苏联，振兴苏联。为了推动改革，他提出了新政治思维，坚决反对教条主义，提倡思想、理论观点的多元化，一再强调要对社会主义一系列原则问题进行再认识。戈尔巴乔夫把改革看作是自己的毕生事业，视为时代和苏联现实赋予他的历史使命。

6月28日

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已引起世界关注。他的改革涉及的领域十分广泛，是全面的改革，包括政治、经济体制，意识形态，社会关系，党的工作，对外政策，教育和科技体制等。

中国的改革正在向纵深发展。为了吸取其他国家特别是苏联这样的社会主义大国改革的经验教训，我们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的支持下，决定编写一套《戈尔巴乔夫年代的改革》系列书，其内容包括：《从企业改革入手——戈尔巴乔夫的经济体制改革》，《民主化·公开性——戈尔巴乔夫的政治体制改革》，《一条马鞍形的认识曲线——苏联社会发展阶段理论》，《一个相互依赖的统一世界——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与苏联对外政策调整》，《迎接世界科技革命的新挑战——苏联教育与科技体制的改革》，《来自莫斯科的改革之风——戈尔巴乔夫的改革与东欧》。每本约七、八万字。这套系列书向广大读者介绍戈尔巴乔夫在各个领域进行改革的主要内容、思路、发展趋向、遇到的主要问题及对策。我们相信，这将有助于读者开阔视野，启发思维。同时，欢迎读者给予批评和指正，帮助我们编好这套系列书。

编 委 会

1988、8

目 录

| | | |
|---|--------------|-----|
| 一 | 苏联第八位领导人上台执政 | 1 |
| 二 | 前人留下的“遗产” | 15 |
| 三 | 改革的历程 | 41 |
| 四 | 经济体制改革理论的新探索 | 65 |
| 五 | 根本改革经济体制的构想 | 92 |
| 六 | 阻碍机制与阻力 | 136 |
| 七 | 疏通改革之路的方法 | 160 |
| 八 | 结束语——改革能成功吗？ | 175 |

一 苏联第八位领导人

上 台 执 政

米哈依尔·谢尔盖耶维奇·戈尔巴乔夫于1985年3月11日任苏共中央总书记，成为继列宁（1917—1924年）、斯大林（1924—1953年）、马林科夫（1953年，任党的总书记仅几天）、赫鲁晓夫（1953—1964年）、勃列日涅夫（1964—1982年）、安德罗波夫（1982—1984年）、契尔年科（1984—1985年）之后的第八位苏联领导人。

戈尔巴乔夫1931年3月2日出生于斯塔夫罗波尔边疆区克拉斯诺格瓦尔杰伊斯克区普里沃利诺耶村的一个农民家庭。这里气候温和，青山绿水，风景优美。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不久，15岁的戈尔巴乔夫就开始了自己的劳动生涯，在机器拖拉机站当农机手。在斯塔夫罗波尔时，18岁的戈尔

巴乔夫就获得了“劳动红旗”勋章。接着，通过斯塔夫罗波尔市的推荐，他于 1950 年即 19 岁时，被送到莫斯科大学学习，攻读法律专业。这样，戈尔巴乔夫离开闭塞、狭窄的农村来到了完全是另一个天地的城市，而且是苏联的政治、文化中心的莫斯科。在这里，为他更多地了解苏联和外部世界提供了极好的机会。

在斯大林执政时期的 1952 年 10 月，21 岁的戈尔巴乔夫加入了苏联共产党。应该说，对戈尔巴乔夫来说，选择这个时间入党，并没有特殊的含义。50 年代初，苏联掀起了一场吸收新党员的运动，这时期入党的人，大部分是象戈尔巴乔夫那样的年轻人。

1955 年，戈尔巴乔夫以优异的成绩从苏联最有名的以莱蒙诺索夫命名的国立莫斯科大学法律系毕业。毕业后，他离开了首都莫斯科重返故乡。但这时与 1950 年来莫斯科时不同，戈尔巴乔夫不再是单身一人，陪同他一起去斯塔夫罗波尔的还有其夫人赖莎·马克西莫夫娜·基托连娜。她是哲学系的毕业生。这位苗条迷人、富有哲理的夫人，很可能对戈尔巴乔夫有不少帮助和影响。

戈尔巴乔夫回到故乡后，先从事共产主义青年团的工作。这是苏联成为党的职业干部通常走的道路。从 1955 年起，他在斯塔夫罗波尔边疆

区先后任共青团斯塔夫罗波尔市委第一书记、宣传鼓动部副部长。在赫鲁晓夫执政时期的 1956 年，即召开苏共二十大开始批判斯大林时，戈尔巴乔夫任共青团斯塔夫罗波尔边疆区第二书记，两年后提升为第一书记。

1962 年 3 月，戈尔巴乔夫改做党的机关工作，具体说担任斯塔夫罗波尔地区农庄农场生产管理局党的负责人，同年 12 月被任命为苏共边疆区委党机关部部长。戈尔巴乔夫在大学学的是法律专业，为了适应农业工作的需要，他立即在斯塔夫罗波尔农业学院学习，于 1967 年学完了他的函授课程，并获得了农业经济学家的资格。在苏联，函授所学课程与通常的全日制和非全日制的课程完全相同。因此，所获得的资历亦是相同的。戈尔巴乔夫获得农业经济学家的资格，对他以后的晋升无疑是重要的。同年，赖莎·戈尔巴乔娃已是 34 岁，有了一个名叫伊莲娜的女儿。这时赖莎已完成了副博士论文，并获得了副博士学位（相当于西方的哲学博士）。她的论文题目是《集体农庄农民日常生活中出现的新情况——以在斯塔夫罗波尔区进行的社会调查为基础》。这个调查材料，对帮助戈尔巴乔夫了解农民，充实和认识党的工作起了不少作用。

具有 8 万多平方公里和约 280 万人口的斯塔夫罗波尔边疆区，在 1960 年后，一直由费·

达·库拉科夫担任区党委的书记。戈尔巴乔夫在这里结识了他。库拉科夫十分赏识戈尔巴乔夫。1962年12月，他让戈尔巴乔夫任该区的区委机关部的部长，这是主管边区全部党员干部的重要职务，加上这区又是个重要产粮区，因此，这一新的任职无疑对戈尔巴乔夫今后发挥更大的作用有着重要的意义。1964年，库拉科夫调往莫斯科，很快就担任了苏共中央主管农业的书记，即成了主管全苏农业的党内最高领导人。在库拉科夫调往莫斯科的第二年即1966年9月，戈尔巴乔夫就担任了斯塔夫罗波尔市党委第一书记。1968年8月起，戈尔巴乔夫任苏共斯塔夫罗波尔边疆区委第二书记，1970年4月任该区委第一书记。这一任职，标志着他已成为苏联党的高级领导的一个成员，可望在下届党代会上成为中央委员。不出所料，在1971年召开的苏共二十四大上被选为中央委员。

戈尔巴乔夫在斯塔夫罗波尔边疆区任党的主要领导职务期间，主要集中力量抓农业。在1970年初，他就在这一边疆区推行以产定奖的制度，试验作业队的制度，根据产量与成本计算劳动报酬。到70年代中期，该边疆区已有1500个机械化作业队。1976年在全区推广作业队制度。根据当时报纸报道，实行作业队制度的水田和旱田的收成，要比未实行作业队制度的分别高

出 50% 和 30—40%。1977 年，戈尔巴乔夫又试行“伊帕托夫方法”。伊帕托夫是这一区的一个地名。新方法与作业队方法刚好相反，把收割机与农业运输车辆全部组织起来，在全区组成大的机动队。在这一年，斯塔夫罗波尔边疆区农业获得好收成。当时执政的勃列日涅夫为此给予了祝贺。戈尔巴乔夫为何从原来提倡实行作业队方法突然转而推行“伊帕托夫方法”，主要是作业队方法受到当时中央一些领导人的反对。戈尔巴乔夫本人的兴趣还是在作业队方法上。几年以后的变化就证明了这一点。若干年后，当戈尔巴乔夫成为重要领导人时，《消息报》1983 年 9 月 29 日发表文章否定了“伊帕托夫方法”。同年，《消息报》又发表消息说，戈尔巴乔夫仍然推荐在农业中实行作业队方法。

1978 年 7 月，库拉科夫逝世。在红场为他送葬的没有当时的主要领导人勃列日涅夫、柯西金、苏斯洛夫和契尔年科等。而致悼词的却是当时还只是一个普通的中央委员戈尔巴乔夫。后来，据可靠消息说，这是因为库拉科夫是自杀的。葬礼之后的第 4 个月，即 1978 年的 11 月，戈尔巴乔夫接替库拉科夫，任苏共中央主管农业的书记，当时他年仅 47 岁，这比当时的政局委员的平均年龄要小 14 岁。据西方一些苏联问题学者分析，调戈尔巴乔夫来莫斯科的是当时主管

苏共意识形态的苏斯洛夫，因为他也曾一度在斯塔夫罗波尔边疆区任党的第一书记。在苏斯洛夫看来，戈尔巴乔夫的长处是：受过良好教育，有能力，是俄罗斯人。大家指望年轻的戈尔巴乔夫把力量集中于农业，改变农业的落后面貌。

1979年，戈尔巴乔夫当选为政治局候补委员，一年之后又当选为政治局委员和中央委员会书记，主管农业。当时他离50岁还差半年。

1982年11月11日勃列日涅夫逝世。第二天，苏共中央委员会选举68岁的安德罗波夫为苏共中央总书记。他执政时间不长，仅15个月。但应指出，在这短短的15个月里，安德罗波夫对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理论提出了不少重大修正，明确指出：目前苏联正处于发达社会主义社会的“开端”或“起点”。他对经济体制改革的一些重大理论问题进行了大胆的探索，强调改革的必要性。在1983年召开的苏共中央六月全会的讲话中他特别强调指出：“我们在社会发展上现在已经接近这样一个历史阶段：生产力的深刻质变以及与此相适应的生产关系的完善不仅已经迫在眉睫，而且已是势在必行了。这不仅是我们的愿望，也是客观的需要，这种必要性我们既无法绕过，也无法回避。与此密切相关的是，人们的意识，通常称之为上层建筑的各种社会生活形式，也得发生变化。”安德罗波夫执政期间，还对生产

资料的公有制理论、分配中的平均主义、民主管理和社会自治、企业自主权与农业中集体承包制等问题，都作了分析，提出了新的看法。他为纪念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撰写的《卡尔·马克思的学说与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若干问题》一文，实际上是对苏联社会主义建设作了一个总结和在理论上的再认识。可以认为，这是他执政 15 个月的代表作。就是在这篇文章中，他作出了当前阻碍苏联社会经济发展的主要原因是体制问题的重要结论。还应值得一提的是，在安德罗波夫执政的 1983 年，苏联科学院西伯利亚分院著名的女院士 T· 扎斯拉夫斯卡娅，在一次学术讨论会上提出了一篇重要的内部报告，即西方广泛流传的秘密报告。报告严厉地抨击了苏联的旧的管理体制，指出斯大林时期形成的体制，虽经多次小修小改，但一次也没有进行能反映生产力已经发生根本变化的彻底改革。她的结论是：集中的行政管理经济的可能性业已用尽，必须更积极地利用与发展市场关系有关的“自动”调节器。

戈尔巴乔夫在这一时期，对安德罗波夫决心改革的政策，持完全支持的态度。他还积极支持安德罗波夫提倡的反对贪污腐化等经济犯罪的整顿纪律的运动。

1983 年 9 月，长期患肾病的安德罗波夫病情恶化，住在孔策沃医院的一间既可当卧室又可

当办公室的病房里，这时戈尔巴乔夫担任了政治局与医院病房之间的联络官的角色。这就是说，苏联其他重要领导人已不太容易见到安德罗波夫了。这个机遇，无疑对加强和巩固戈尔巴乔夫的地位起了作用。再说，由于过去安德罗波夫因治疗肾病常去高加索基斯洛沃茨克温泉疗养院养病，作为当地党的领导人的戈尔巴乔夫自然要亲自迎接这位要人。这样，他们俩人之间早就有了相识和相互了解的机遇。西方学者认为：“假若戈尔巴乔夫是远在北方的摩尔曼斯克的党首脑，他肯定就不可能登上总书记的宝座”。^① 在苏联的政治体制条件下，这种说法不无道理。

这里顺便提一下，戈尔巴乔夫任总书记后提出的很多新思维，其中不少是他自己的独创，但也应看到，有不少是安德罗波夫在世时早已提出。因此，在研究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时，完全与安德罗波夫隔裂开来，完全算作是戈尔巴乔夫的，那是不公正的。

1983年年底，安德罗波夫的病情恶化。一个明显的例证是，当年举行苏共中央十二月全会时，安德罗波夫已不能出席，而是发表了一篇书面讲话。在这一篇最后的讲话中，他还是强调改

^① 克里斯蒂安·施密特·豪尔：《戈尔巴乔夫——俄罗斯的旋风》，工人出版社，1987年，第65页。

革的必要性。讲话的结论性意见是：只有综合地、相互联系地研究改进管理体制问题，才能解决最充分利用社会主义生产方式所具有的优越性的任务。这应该成为苏共纲领修订本的重要组成部分。1984年2月9日，安德罗波夫终于去世。他去世后，立即面临着谁是总书记候选人这个尖锐问题。争论的焦点集中在让年富力强的戈尔巴乔夫担任，还是让老态龙钟的契尔年科担任。经过两天的激烈争论，2月13日，苏共中央全会根据当时的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吉洪诺夫的建议，推选契尔年科任新的总书记。苏联为何作出这样的抉择，有各种说法。但更多的说法是：党内强烈希望把权力移交给更年轻一代的人，即希望戈尔巴乔夫上台的人，亦包括戈尔巴乔夫本人在内，经过激烈争论，与老一代领导人之间达成了一次妥协性的默契：再由老一代人任最高领导，作一次过渡。但同时也提出了条件：一是今后不能把安德罗波夫视为苏联历史上不存在的人；二是不能任意给勃列日涅夫恢复名誉。这两条，在1984年2月13日契尔年科当选为总书记的讲话中得到了体现。他在讲话中明确表示，今后毫无保留地执行安德罗波夫的路线，而在讲话中连勃列日涅夫的名字都未提到。另外，这种妥协，明显反映在有关这次中央全会的新闻报道中。按惯例，全会应由新选出的总书记契尔年科

作闭幕词，但却由戈尔巴乔夫作了闭幕讲话。他在讲话中说：“统一和团结的精神是这次中央全会的特征”。从安德罗波夫的葬礼来看，送葬的队伍是由契尔年科和戈尔巴乔夫共同率领的。这些做法，都说明在新老领导人之间达成妥协的条件下，戈尔巴乔夫实际上已成为苏联党的第二号人物。

之所以形成上述妥协的局面，简单地说，在中央领导层中，还有相当多的人怕年轻的、积极主张改革的戈尔巴乔夫上台，可能会失去他们既得的权力、地位和利益。再说，这些人对赫鲁晓夫时期的改革至今还心有余悸。另外，还应看到，在安德罗波夫执政时期，由于采取了一些改革措施及反贪污腐化运动，已撤换了一些领导人的职务，连勃列日涅夫女儿加琳娜的一些好友也受到了严厉的惩罚。在这种情况下，契尔年科就成了容易接受的人选。

实践证明，病魔缠身的、长期担任勃列日涅夫总管家角色的契尔年科，在他执政的一年多的时间里，可以说是无所事事。定于 1986 年 2 月召开的苏共二十七大的筹备工作，不是由任总书记的契尔年科负责，而是由戈尔巴乔夫负责的。难怪《真理报》主编 B·阿法纳西耶夫在 1984 年 10 月 9 日对日本《朝日新闻》说：戈尔巴乔